



关注“山西廉政文化丛书”(7)

历史叙事 共情表达

孙国强

接到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作家协会关于撰写《廉能第一于成龙》传记文学作品的任务时，我顿感压力山大。

若论这个题材，其实我并不陌生。当年参加2017版电视剧连续剧《于成龙》编剧工作时，这位从吕梁山坳里走出的“天下第一廉吏”就已完全融入我的精神世界。但问题是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后，于成龙逐渐为全国观众所熟知，此外又有戏剧、话剧等多部同名舞台剧纷至沓来，一代廉吏于成龙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次创作于成龙传记文学作品，能否在史学叙事上写好这个人，并且在文学叙事上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特色，是一个必须慎重对待且深入思考的课题。

著名作家柳青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法。”写好《廉能第一于成龙》（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这部传记文学作品，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于成龙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关系问题。于成龙的传奇人生，如同暗淡夜空中一闪而过的耀目流星，留给世人难以释怀的深深思考。究竟是于成龙这样一批清官廉吏，成就了康熙王朝？还是那个风起云涌、人才辈出的时代，成就了一介书生的人生梦想？于成龙这样的清官廉吏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二是于成龙的辉煌人生纯属偶发事件、根本无法复制呢？还是事出有因，背后确有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可循？我们从中应该汲取怎样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治国理政经验？

三是应该用怎样一种叙事文本和语言特色来表达于成龙和他所处的时代，才能让当下的读者特别是“90后”“00后”产生同频共振的社会效果？

我们从于成龙入仕以后的宦游历程不难发现，清朝初期的政治生态虽然不能说没有问题，但总体上讲还是比较健康的。否则，以于成龙的科举贡出身和寒微的家族背景，仅仅通过20多年的埋头苦干，要想实现从七品知县到一品封疆大吏的人生飞跃，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说于成龙在广西遇到了巡抚金光祖、总督卢兴祖两位大贵人，荣膺“卓异”得到提拔，是因为运气好、老天照应的話，那么他在四川遇到巡抚张德地，在湖广遇到巡抚张朝珍，

在福建遇到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以及康亲王杰书，还有给予于成龙深刻影响的熊赐履、陈廷敬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出自偶然因素的作用。这样一批封疆大吏、股肱谋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对于成龙的深情厚谊和鼎力支持，足以反映清朝初期政治生态的健康状况。

从于成龙三次举“卓异”的情况分析，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清朝初期大多数督抚级官员，还是讲原则、有底线、顾大局的，没有他们的保护与提携，于成龙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很难脱颖而出。而于成龙进入康熙皇帝的视野，是在清康熙十七年（1678），由湖广江防道调任福建提刑按察使以后，那时他已是位高权重的正三品监察官员了。

当然，于成龙历史主动精神的形成，与他青少年时代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他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和执政为民的高尚品格，则来自于从政以后日复一日不断的磨炼与长期的积累，并在不断超越、不断重塑中获得人格升华。如果我们对照于成龙学习、生活和宦游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堪称那个时代的事业成功人士。童年启蒙阶段“格物”“致知”，少年时期“诚意”“正心”，青年时“修身”“齐家”，由中年步入老年阶段“治国”“平天下”。于成龙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提升，实现了那个时代平民知识分子人生价值的最大化。

以往的历史学和传记文学的叙事方式，在电子阅读和自媒体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下，可能难以让广大青年读者产生同频共振的阅读体验。如何把枯燥乏味的史学叙事加以转换更新，让读者在轻松愉悦的文字环境中穿越历史的时空与古人对话交流？这是近些年来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我在反复阅读《史记》时发现，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大家，其实他更是一位文学巨匠。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写，都是采用了“脑补”即文学创作的方法，从而使那么多的历史人物生动而鲜活地跃然纸上。比如他笔下的鸿门宴，从事件起因、人物内心到角色对白，几乎是一部相当缜密而完整的影视文学剧本。因此，古圣先哲与我们在心灵上是完全可以沟通和契合的，引导当代青少年读者走近历史、热爱历史，是我们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于成龙任合州知州时，上司让人给予于成龙下了帖子，明确索要几斤大鱼几斤小虾。于成龙不慌不忙，顺手拿起笔来，洋洋洒洒写道：“民穷极矣，民脂膏竭矣！无怜而竭泽索鱼，不乐民反乐鱼，何忍得鱼乎？”

廉政文化的感召力

——读《廉能第一于成龙》

韩玉峰

孙国强撰写的《廉能第一于成龙》（北岳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生动鲜活地展现了于成龙的生命轨迹和清廉道路，感天动地，激人奋进。作者运用简洁流畅的语言，描写于成龙廉政爱民、知行合一的品格，誓死不昧天理良心的精神，彰显廉政文化的主题；书写作者的深刻感悟，为读者凝结学习于成龙精神的座右铭。

这本书分为“生平小传”“廉能第一”“当代启示”“箴言警句”四部分，当然以“廉能第一”的13章为主，然而“小传”亦不可小觑，作者在不足万字的文章里概括出于成龙从45岁出仕到67岁因积劳成疾而逝于两江总督任上短暂而壮美的人生。

于成龙有《于清端公政书》《先儒正修录》《先儒齐治录》等多种著作，作者不吝于成龙在著述立学方面的成果，而是以大量篇幅写于成龙在“廉能”方面的主要成就和卓越功勋，写于成龙是一位从七品县官升迁为从一品封疆大吏，胸怀社稷、心系民生，朝廷三次授予“卓异”，被康熙帝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清初循吏、名臣。

于成龙以“副榜贡生”的身份和45岁的年龄奔赴人烟稀少、盗贼横行、民不聊生的广西罗城任职。县中居民仅6户，既无城郭房舍，更无县衙公署，作者以悲悯的口吻写于成龙这条山西汉子，悲叹道：“哀哉！此一活地狱也，胡为乎来哉！”

作者有很强的叙事能力和塑造人物的本事，写于成龙的重理念、廉洁奉公、无私无畏；写于成龙的重实践，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写于成龙对腐败的痛恨和对清廉的向往，具有极大的共情性，显示了廉政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

于成龙不仅清廉正直，还是一位颇具文艺气质且重情重义的学者型官员。作者广泛阅读，引用了许许多多成龙的诗词美文。于成龙曾为友人郑肯崖的诗集作序，写道：“肯崖，黄冈幽人，自临皋赤壁、闽海春潮、燕山朔雪，靡不朝夕与共。”

孙国强发挥编剧才能，在《廉能第一于成龙》中书写了引人入胜、感人至深的故事，给读者以沉浸式的代入感。

其中小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英文不同的语境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流萤集》里的中国古典诗词意象

王钦刚

一去不回还
落花的意象和文字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俯拾皆是。
李白在诗中写道：“白日照绿草，落花散且飞。”李煜在词中写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黄庭坚在诗中写道：“春残已是风和雨，更著游人撼落花。”

《流萤集》的第101首写到了小草：
The grass survives the hill
through its resurrections from countless deaths.

译为：
无数死而复生
小草比大山长青
草的意象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也不少见。
白居易诗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彦谦诗中写道：“天北天南绕路边，托根无处不延绵。萋萋总是无情物，吹绿东风又一年。”
其中小草顽强的生命力在中英文不同的语境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流萤集》的第145首这样写道：
An unknown flower in a strange land
speaks to the poet:
"Are we not of the same soil, my lover?"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岩译本译为：
一朵不知名的花
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
对诗人说道：“我的情人，
咱们不是出于同一土壤的吗？”
陌生土地的无名花朵
开口跟诗人搭腔：
“爱人啊，我俩莫不是同乡？”
读到这首英文诗，笔者不禁想起了一首似曾相识的唐诗——崔颢的《长干曲四首》其一：“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于成龙初任两江总督，便向以鱼壳为首的黑恶势力以及其背后的“保护伞”表明了态度，并设计抓捕了鱼壳。月黑风高夜，鱼壳逃进，意欲行刺于成龙。于成龙一番入情入理的独白，让藏身房梁的鱼壳感动不已，并认罪伏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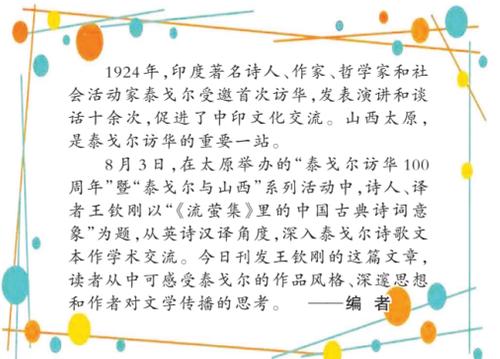
配图为《廉能第一于成龙》插图 李庆富 绘



于成龙任贵州同知时，常以俸银周济穷人，自己却食糠粥。一位乡绅听说后，专程上门，提出品尝于府的糠粥。于成龙笑呵呵地说：“初次登门，怎好让你喝糠粥？今天权且以米饭招待你，如果下次再来看我，就只好以糠粥待客了。”乡绅这才相信“糠粥”之说。不虛。

配图为《廉能第一于成龙》插图 李庆富 绘

《流萤集》里的中国古典诗词意象



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受邀首次访华，发表演讲和谈话十余次，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山西太原，是泰戈尔访华的重要一站。

8月3日，在太原举办的“泰戈尔访华100周年”暨“泰戈尔与山西”系列活动中，诗人、译者王钦刚以《流萤集》里的中国古典诗词意象为题，从英诗汉译角度，深入泰戈尔诗歌文本作学术交流。今日刊发王钦刚的这篇文章，读者从中可感受泰戈尔的作品风格、深邃思想和作者对文学传播的思考。——编者

泰戈尔的英文诗一向高朋满座，它不仅曾经在欧美风靡一时，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

100年前，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泰戈尔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留下了他的萍踪诗迹，而《流萤集》便是其最好的注脚。

泰戈尔生前出版了《吉檀迦利》《飞鸟集》《新月集》《园丁集》《流萤集》等9部英文诗集，《流萤集》（1928年版）是其中最晚问世的一部。这部诗集源于泰戈尔的中国和日本之行，正如他在扉页中写道：

《流萤集》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
彼时我常常应人之请
将我的点滴思想
题写于扇子和丝绸上
《流萤集》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和日本俳句的影响，短小简洁而又意味深长。

1924年泰戈尔访华期间，徐志摩与林徽因曾追随其左右，参与翻译与接待工作，泰戈尔耳闻目睹了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也认为他俩是理想的一对，便有意促成二人的好事。无奈林徽因已芳心有所属，蓝天绿地遥遥相望，令人感叹。

于是泰戈尔在给林徽因的赠诗中（收录于《流萤集》之66）表达了他未能成月老的遗憾与惆怅——

天之蓝渴望地之绿
徒留其间风的叹息
《流萤集》与《飞鸟集》类似，与泰戈尔的其他英文散文诗不同，大多是三言两语的小诗，其中不乏花草树木、日月星